

习凿齿史论的时代特征

金仁义

(安庆师范大学 学报编辑部, 安徽 安庆 246133)

[摘要] 习凿齿是东晋时期史学名家,其《晋承汉统论》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颇具影响,向来受到关注。但《晋承汉统论》并非习凿齿史论成就之全部,佚文可见习凿齿史论在旨趣和风格上自有特色。习凿齿史论关注人物品评、兴亡成败等时代问题,坚持以儒学为准绳、以惩劝为旨归,发扬了先秦以来史学经世的优良传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因事而立论的风格保证了习凿齿史论中客观史事与主体认识的统一,增强了习凿齿史论的高度和力度。习凿齿史论理事合一,形质相兼,丰富了东晋史学的内涵,推进了东晋史论的发展。

[关键词] 习凿齿 史论 东晋史学 时代特征

[中图分类号] K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332 (2025)03-0038-13

史论是指关于客观历史如史事、人物、历史现象等问题的评论。史论渊源于先秦,发展至魏晋时期进入新阶段,表现在形式上呈现多样化,内容上注重人物品评、政权兴亡和民族关系等时代问题。习凿齿为东晋中叶史家,以文笔著于世,撰有《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逸人高士传》等史著,颇受海内外学者关注,不少前辈时贤多有专题论述。^① 相较史事整理成就,习凿齿的史论和史学观念更为独到,在当时及后世都更具影响力。习凿齿的晋承汉统观别具一格,在史学史上有着特

[收稿日期] 2025-04-28

[作者简介] 金仁义,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魏晋南北朝史。

[基金项目]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汉至唐初史学世家研究”(项目编号: AHSKZD2020D0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古史学世家研究”(项目编号: 21BZS022)阶段性成果。

- ① 主要成果有:刘静夫:《习凿齿评传》,《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二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6年;陈国灿:《论习凿齿的史学思想》,《成长中的新一代史学——1991年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会议论文集》,西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张承宗:《〈汉晋春秋〉在史学上的影响》,《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2期;李传印:《习凿齿史学思想初探》,《汉水文化研究——汉水文化暨武当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4年;赵海旺:《从〈晋承汉统论〉看习凿齿正统史观》,《甘肃理论学刊》2006年第4期;熊明:《习凿齿及其杂传创作考论》,《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黄惠贤、柳春新:《〈晋书·习凿齿传〉述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4辑,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2008年;吴直雄:《习凿齿及其相关问题考辨》,《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方圆:《论习凿齿之史学》,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刘治立:《习凿齿与王夫之的三国正统论比较》,《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黄惠贤:《对习凿齿卒年及其著作的检讨和蠡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6辑,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2010年;吴直雄:《习凿齿及其相关问题再考辨》,《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黄尚明:《〈汉晋春秋〉的写作背景、史学思想及其影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余鹏飞:《论〈汉晋春秋〉的历史价值》,《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2年第9期;叶植:《习凿齿左迁、卒年若干问题辨析》,《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叶植:《〈襄阳耆旧记〉史料价值献疑》,《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等。

殊地位,顾炎武谓“正统之论,始于习凿齿”^①,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对其正统论屡有提及,台湾学者雷家骥以习凿齿正统观为中心多角度探索东晋批判史学^②。诚然,正统观彰显了习凿齿史学独到见解和独特影响,但正统论并非其史论的全部,习凿齿史论成就仍有待学界全面、系统而深入地加以审视。

习凿齿临终上奏的《晋承汉统论》,是独立的史论专文,所讨论的汉晋关系,既是重大的历史问题,也是重大的现实问题,形式上虽接近东晋干宝《晋纪·总论》,史学观念之影响则似乎远过之。习凿齿所著《汉晋春秋》,是东晋中叶编年体史著代表作之一,现存有辑本,其中往往见有长短不一的史论。这些史论原散见于《三国志注》《世说新语注》《宋书》《太平御览》《资治通鉴纲目》等史籍中,相对《晋承汉统论》专文,学界关注和讨论就显得较为薄弱。习凿齿史论佚文多是聚焦人物品评和兴亡得失,立论则以儒学为准绳、以惩劝为旨归、以史实为依据,所见旨趣与风格自有特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干宝、袁宏等史家史论一起,共同丰富了东晋史学时代内涵。本文即拟以习凿齿史论断章为中心,适当兼及《晋承汉统论》奏疏,以期对习凿齿史论及其时代特征进行再认识,愿就教于方家。

一、以儒学为准绳

众所周知,尊蜀汉为正统是习凿齿有别于同时代史家一个显著特色,某种意义上说,蜀汉先主刘备称帝是习凿齿正统论的一个支点。裴松之注《三国志》引证了习凿齿关于刘备的史论4条,分别论及先主走当阳、庞统谏先主、法正劝先主纳刘瑁妻及费诗谏先主称尊号等4事,于现存习凿齿人物评论中数量为最。目前学界对这4则史论的探讨,与其在习凿齿思想中应有之义并不相称。下面即先以这4则史论为线索考察习凿齿持论的儒学标准。

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南征刘表,刘备败走当阳事即发生在此时,《三国志》记云:

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闻之,遂将其众去。过襄阳,诸葛亮说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乃驻马呼琮,琮惧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或谓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心弃去!”^③

战局发展如刘备左右所担心,曹操追兵至当阳长坂后,“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④。败走当阳,只是刘备称帝历程中一个插曲而已,未堪重大或转折,但确实触及刘备何以能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根本。陈寿在先主传后评之“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⑤,这个立论,显然也应该是观照了刘备败走当阳前后的表现。习凿齿的立论,则与陈寿在切入点上有明显不同。裴松之于刘备“济大事必以人为本”语后注引了习凿齿评论:

习凿齿曰: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⑥

习凿齿具体点明了刘备“以人为本”思想施行的路径,即“信义愈明”,而非是小恩小惠。习凿齿这

①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3页。

② 雷家骥:《中国古代史学观念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15-351页。

③ 《三国志》卷32,《先主备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77页。

④ 《三国志》卷32,《先主备传》,第878页。

⑤ 《三国志》卷32,《先主备传》,第892页。

⑥ 《三国志》卷32,《先主备传》裴松之注,第878页。

个见解是独到而精当的。孔子主张君子“义以为质”“信以成之”^①，孟子倡导“仁内义外”，言“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②。习凿齿关于先主走当阳之论，并未就刘备一时之得失发表评论，而是推崇其“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说明他判定此事是以是否遵循儒家君子“义以为质”“信以成之”为标准的。这种视角，在高度上与陈寿的评价有些许不同。

相较刘备走当阳事的评论，习凿齿就“庞统谏先主”的评论，更能清晰地看到习凿齿史论准绳所在。庞统劝谏先主事发于刘备入川后，陈寿记刘备用庞统取蜀中计，随后载曰：

即斩怀、沛，还向成都，所过辄克。於涪大会，置酒作乐，谓统曰：“今日之会，可谓乐矣。”统曰：“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非仁者邪？卿言不当，宜速起出！”于是统逡巡引退。先主寻悔，请还。统复故位，初不顾谢，饮食自若。先主谓曰：“向者之论，阿谁为失？”统对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乐如初。^③

庞统谏先主事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于刘备取蜀进程、刘备和庞统各自历史形象，都有增进认识之效。习凿齿就此事发表看法，史论内涵较为丰富，值得寻味。裴松之注中引及：

习凿齿曰：夫霸王者，必体仁义以为本，仗信顺以为宗，一物不具，则其道乖矣。今刘备袭夺璋土，权以济业，负信违情，德义俱愆，虽功由是隆，宜大伤其败，譬断手全躯，何乐之有？庞统惧斯言之泄宣，知其君之必悟，故众中匡其失，而不修常谦之道，矫然太当，尽其蹇谲之风。夫上失而能正，是有臣也；纳胜而无执，是从理也；有臣则陛隆堂高，从理则群策毕举；一言而三善兼明，暂谏而义彰百代，可谓达乎大体矣。若惜其小失而废其大益，矜此过言，自绝远谏，能成业济务者，未之有也。^④

习凿齿于此开宗明义，断然提出了认识王业成败的标准，即“体仁义以为本，仗信顺以为宗”。由此出发，他批评刘备取蜀属“负信违情，德义俱愆”。如果把认识放到习凿齿整体思想体系和价值取向来看，他作出这个论断是不容易的。“晋承汉统论”是习凿齿史学思想最为独到之处，为此，三国之中，习凿齿尊蜀汉而贬魏、吴。益州是刘备霸业之基，是蜀汉政权根本，进一步说，刘备定蜀是习凿齿史学思想得以立足的起点。但是，我们看到，习凿齿并未言有隐讳，仍然对刘备取蜀有违儒家纲常处进行了批判。虽然习凿齿后来又对刘备、庞统进行了正面论说，肯定他们各有君臣之道，也指出不可因“小失”而废“大益”，回到了对刘备“成业济务”的肯定上来。不过，我们显然不能因此就忽视习凿齿对儒学的秉持和坚守，忽视习凿齿史论以儒家为准绳的坚定。^⑤

如果说习凿齿在“庞统谏先主”事上对刘备的批评尚有回旋的话，那么他在法正劝先主纳刘瑁妻吴氏事上则将批判进行到底。吴氏出自陈留，为东汉宗室、益州牧刘焉的儿媳，刘备入川时寡居于家。陈寿记刘备纳之始末，云：

先主既定益州，而孙夫人还吴，群下劝先主聘后，先主疑与瑁同族，法正进曰：“论其亲疏，何与晋文之于子圉乎？”于是纳后为夫人。^⑥

习凿齿对孙夫人还吴事有特殊关注，《汉晋春秋》采摘有陈寿未录之事，裴松之注见：“《汉晋春

①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15页。

②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451页。

③ 《三国志》卷37，《庞统传》，第955-956页。

④ 《三国志》卷37，《庞统传》裴松之注，第956页。

⑤ 裴松之在注引习凿齿史论之后，复加评论，语云：“臣松之以为谋袭刘璋，计虽出於统，然违义成功，本由诡道，心既内疚，则欢情自戢，故闻备称乐之言，不觉率尔而对也。备宴酣失时，事同乐祸，自比武王，曾无愧色，此备有非而统无失，其云“君臣俱失”，盖分谤之言耳。习氏所论，虽大旨无乖，然推演之辞，近为流宕也。”（《三国志》卷37，《庞统传》裴松之注，第956页）裴松之立论较为细致，指向具体，也不无道理，但不及习凿齿史论意旨宏阔远大，所讥习凿齿发论放荡恣肆，显然未晓习凿齿内在心声。

⑥ 《三国志》卷34，《先主穆后传》，第906页。

秋》云：先主入益州，吴遣迎孙夫人。夫人欲将太子归吴，诸葛亮使赵云勒兵断江留太子，乃得止。”^①习凿齿补出孙夫人还吴与太子刘禅的牵连，将孙夫人还吴与刘备政权国本联系起来，显示出他对史事敏锐的捕捉能力。实际上，这也从侧面说明刘备再纳后的重要。只是，习凿齿对刘备所纳对象为刘氏宗妻吴夫人颇有微词。陈寿记纳吴夫人事甚简，且未予置评，习凿齿发论用语过百，云：

夫婚姻，人伦之始，王化之本，匹夫犹不可以无礼，而况人君乎？晋文废礼行权，以济其业，故子犯曰：有求于人，必先从之，将夺其国，何有于妻，非无故而违礼教者也。今先主无权事之逼，而引前失以为譬，非导其君以尧、舜之道者。先主从之，过矣。^②

习凿齿从儒家婚姻伦理出发做了理论定性，又结合史实分析了刘备与晋文公身处不同，最后断云“先主从之，过矣”，结论掷地有声，甚至可谓言辞激烈。其实，刘备纳吴夫人，盖非纯粹婚姻人伦纲常事。吴氏父与刘焉有旧，兄吴壹为刘焉子刘璋麾下重臣，吴氏族父吴匡为汉末大将军何进重要部属，吴壹族弟吴班为人豪爽侠义，著称于当时，陈留吴氏彼时当是颇有实力和影响的大族。吴壹父举家随刘焉入蜀，刘焉纳吴壹妹为子媳，不排除有结婚自固之意。刘备入川时，吴壹是益州东州集团的代表人物，以中郎将领兵拒刘备于涪。只是在刘备与刘璋之间的抉择，吴壹选择了刘备，为刘备定益州做出巨大贡献。法正曾是刘璋部下，对益州政治集团形势了然于胸，他的建言足以引起刘备的重视。综合考虑吴壹影响、法正建言及益州初定的形势，刘备纳宗妻吴氏就不无道理了，其背后动机同样不排除以婚姻而自固的可能。尽管如此，习凿齿并没有放过刘备，遽论刘备之失。检验习凿齿史论，其立论依据便是“匹夫犹不可以无礼，而况人君”，其批判武器便是儒家“尊礼”之主张。

费诗谏先主称尊号，事发于刘备政权发展关键时节，显现刘备称帝面临的阻力和困境。陈寿记载了费诗劝谏详情，语云：

后群臣议欲推汉中王称尊号，诗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逼篡位，故乃羁旅万里，纠合士众，将以讨贼。今大敌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与楚约，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阳，获子婴，犹怀推让，况今殿下未出门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诚不为殿下取也。”由是忤指，左迁部永昌从事。^③

对于费诗的建言，陈寿、习凿齿与裴松之都有注意，但有所不同，陈寿用语不多，仅评费诗“率意而言”^④，聚焦费诗率性上。习凿齿的评论则严肃得多，直指谏言本身，裴注云：

习凿齿曰：夫创本之君，须大定而后正己，纂统之主，俟速建以系众心，是故惠公朝虜而子圉夕立，更始尚存而光武举号，夫岂忘主徼利，社稷之故也。今先主纠合义兵，将以讨贼。贼强祸大，主没国丧，二祖之庙，绝而不祀，苟非亲贤，孰能绍此？嗣祖配天，非咸阳之譬，杖正讨逆，何推让之有？于此时也，不知速尊有德以奉大统，使民欣反正，世睹旧物，杖顺者齐心，附逆者同惧，可谓闇惑矣。其黜降也宜哉！^⑤

习凿齿在《晋承汉统论》中有“吴魏犯顺而强，蜀汉杖正而弱”^⑥的说法，定义蜀汉政权为“顺”与“正”，习凿齿驳费诗之言，批评其“不知速尊有德以奉大统，使民欣反正，世睹旧物，杖顺者齐心，附逆者同惧，可谓闇惑矣”，其中“杖顺齐心”论调与奏疏是一脉相承的。还须注意的是，习凿齿强调“尊有德以奉大统”，提出刘备及其政权“有德”说法，这显然也是贯彻了儒家“为政以德”主张。习凿齿蜀汉政权“杖顺”说和“有德”说，延续和贯彻前揭其“必体仁义以为本，仗信顺以为宗”的主

① 《三国志》卷34，《先主穆后传》裴松之注，第906页。

② 《三国志》卷34，《先主穆后传》裴松之注，第906页。

③ 《三国志》卷41，《费诗传》，第1016页。

④ 《三国志》卷41，《费诗传》，第1017页。

⑤ 《三国志》卷41，《费诗传》裴松之注，第1016-1017页。

⑥ 《晋书》卷82，《习凿齿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57页。

张,他对费诗谏言的否定,还是在秉持儒家思想之准绳。裴松之在注引习凿齿史论后,复加按语云“臣松之以为凿齿论议,惟此论最善”^①,这是对习凿齿立论主张和立论标准的高度肯定。

至此,我们完成了习凿齿关涉先主刘备史论的考察,分析可见,习凿齿一以贯之地以儒家思想主张作为臧否人物或史事的标准。此前学界对习凿齿史论标准问题也有认识,对其秉持儒学多有认同,如刘静夫以习凿齿评“高堂隆敢谏”“毋丘俭举事”“张昭不朝”等事说其“以儒家名教作为评史的标准”^②,黄尚明以习凿齿论周瑜鲁肃、评高堂隆和向雄等事为中心得出其“提倡儒家伦理,臧否历史人物”^③史学思想特色,方圆从君臣之义、道德信义为立国之本、为人处事倡导名节等方面论述习凿齿“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评价人物的标准”^④史学思想,都是充分关注了习凿齿史论儒学准绳的特色。郑先兴有关习凿齿“竭节赴义”历史观^⑤,李传印有关习凿齿的“名教史观”^⑥,也有相近意味。有关习凿齿对先主刘备史论的集中分析,是对学界已有认识佐证和推进,结论是,习凿齿史论以儒学为准绳,不仅确然,也是有力的、具有深度的。

在历史评论中坚持儒学标准,是习凿齿身处时代史家的基本原则。东晋史学家干宝、孙盛、袁宏等,都好发史论。干宝在《晋纪·总论》中倡导儒家仁政,宣扬“民情风教,国家安危之本”^⑦,有学者还提出干宝史学思想具有“崇儒贬玄”内涵^⑧。孙盛史论“强调儒学的忠孝伦理”,有较为鲜明的“严明政刑,恢复礼制的史学思想”^⑨。袁宏主张“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⑩,有“引玄入史”特质,他对名教之本的阐释,“论述的重点常在于君臣关系”^⑪。可以看出,他们史学思想基本面貌,与习凿齿史论和思想同频共振,有着高度一致。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史论以儒学为准绳,并非习凿齿之发明,而实是东晋史学的时代特征。甚或言之,也是东晋之前及东晋之后史家发论基本准绳,是以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于整理前此史学断言“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⑫。

习凿齿博学洽闻,思想丰富,既亲佛又近玄,同名僧释道安酬和通气,与求本逾玄的简文帝、桓秘之流相为知音,但其思想底色仍是儒学,乃至桓温有“徒三十年看儒书,不如一诣习主簿”^⑬之誉。在魏晋以来儒学跌落独尊宝座、相对式微的形势下,习凿齿谙熟儒学,坚持以儒学为历史评论的准则,通过其史学实践有效坚守儒家思想,客观上有助于巩固儒学阵地、拓展儒学传播。易言之,无论是就习凿齿与同时代史家款曲相通而言,还是就其史学撰述有助于当时儒学的坚持与传播来说,习凿齿史论以儒学为准绳,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二、以惩劝为旨归

《汉晋春秋》是习凿齿最具代表性的史学撰述,也是其思想主旨最为鲜明、史论最为集中的史学撰述。《晋书》本传整理习凿齿修撰《汉晋春秋》事是这样说的:

是时温觐觐非望,凿齿在郡,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引世祖讳

① 《三国志》卷41,《费诗传》裴松之注,第1017页。

② 刘静夫:《习凿齿评传》,《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二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6年,第335-336页。

③ 黄尚明:《〈汉晋春秋〉的写作背景、史学思想及其影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④ 参见方圆《论习凿齿之史学》,湖南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⑤ 郑先兴:《习凿齿史学思想简论》,《许昌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⑥ 李传印:《习凿齿史学思想初探》,《汉水文化研究——汉水文化暨武当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4年。

⑦ 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929页。

⑧ 李峰:《干宝史学思想钩沉》,《殷都学刊》2002年第1期。

⑨ 乔治忠:《孙盛史学发微》,《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4期。

⑩ 袁宏:《后汉纪》,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页。

⑪ 白寿彝:《陈寿、袁宏和范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4年第1期。

⑫ 刘勰:《文心雕龙》卷4,《史传》,上海涵芬楼影印四部丛刊本,1922年版。

⑬ 《晋书》卷82,《习凿齿传》,第2153页。

炎兴而为禅受,明天心不可以势力强也。凡五十四卷。^①

此处“温”即东晋中叶权臣谯国龙亢桓温。学界对这段材料多有关注,台湾学者雷家骥更是用力精深,至“恒苦思此段记载的内涵意义”,并据之结合习凿齿《晋承汉统论》,反复探索东晋初期的批判史学和批判裁制下的东晋史学,揭示习凿齿藉史经世的思想特色。^②雷家骥的这种解读,是沿着《晋书》修撰者的认识前进的。

上引史料大体可分为五个方面意思:一是说明习凿齿撰史动机,将其与桓温个人联系起来;二是说明《汉晋春秋》起讫断限;三是对《汉晋春秋》中三国蜀、魏与晋关系作以历史解释;四是点明《汉晋春秋》核心观点;五是补叙《汉晋春秋》卷帙。单就历史编纂而言,于习凿齿著《汉晋春秋》以裁正桓温后,言明“凡五十四卷,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即可,非要补充,也可进一步点明《汉晋春秋》编年体通史的首创意义。但唐史臣似乎偏偏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或者说对此毫无措意,而是特特说明《汉晋春秋》的汉亡而晋兴、晋受天命而不以势力强夺的主张和意旨,彰明习凿齿得以裁正桓温的历史基础和思想基础。唐初史臣引入习凿齿撰史事,意不在介绍《汉晋春秋》,而是申论习凿齿撰史裁制桓温的旨趣。习凿齿不是因为史才不凡、兴味盎然而自发撰史,而是因其史识卓尔、因应现实而自觉撰史。其撰著《汉晋春秋》,诚如《晋书》史臣卷末发论,乃是“彰善瘅恶,以为惩劝”^③。以惩劝为旨归,是《汉晋春秋》修撰的逻辑起点,也是习凿齿诸多史论出发点和归宿。

习凿齿史学撰述多半亡于两宋,清人汤球、黄奭和严可均皆有辑佚但各有缺漏。《晋书》本传称“习亦研思”^④,习凿齿既以思想取胜,其史论必然较为丰富,惜乎未尽传世。《晋承汉统论》是习凿齿积三十余年理论沉思的总结和升华,是习凿齿统合历史与现实思考的心血结晶,也是习凿齿落实以史惩劝意旨的集中体现,学界对此已多有阐发^⑤,其现实经世之突出、时代指向之鲜明,乃至清四库馆臣讥之为“孚于当代之论”^⑥。揆之诸史,除《晋承汉统论》独立成篇外,还见有习凿齿以“习凿齿曰”“主人曰”所发史论共计19条,学界对此也有涉及,但剩义尤多。现整理诸条如下(见表1),以便分析。

左丘明言“《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⑦。学者是以称“《春秋》开创了以史惩劝的史学”^⑧。“以史惩劝”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一种传统。别善恶、明是非、定褒贬,是落实以史惩劝旨归的基本途径。毋庸置疑,很多时候善恶、是非与褒贬不能自见。汪荣祖论“诤评”说:“近人更拟借‘哲学之诠释’,与夫‘文字之评鹭’以治史,莫非欲令书之者,曲通隐晦,而使见之者一目了然也。斯亦铨评之微旨欤?”^⑨史论就是所谓的“铨评”,能“使见之者一目了然”,是史家别善恶、明是非、定褒贬最直接的手段。检阅表中断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习凿齿史论聚焦于人物的品评定性和史事的得失成败,这种视角,为东晋时人所普遍持有,乃东晋之时代意识。更须看重的是,习凿齿论史态度鲜明,价值评判绝不含糊,如评周瑜、鲁肃说“真小人也”,评后主改元说“君子是以知蜀之不能东迁也”,评张昭闭户拒命“岂不悖哉”,评高堂隆“可谓忠臣也”,评司马景王“可谓智矣”,评向伯茂“可谓勇于蹈义也”,评傅玄“知无

① 《晋书》卷82,《习凿齿传》,第2154页。

② 雷家骥:《中国古代史学观念史》,第315-351页。

③ 《晋书》卷82,《习凿齿传》,第2159页。

④ 《晋书》卷82,《习凿齿传》,第2160页。

⑤ 参见刘静夫《习凿齿评传》,《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二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6年;赵海旺《从〈晋承汉统论〉看习凿齿正统史观》,《甘肃理论学刊》2006年第4期;刘治立《习凿齿与王夫之的三国正统论比较》,《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等。

⑥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6页。

⑦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70页。

⑧ 杜维运:《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301页。

⑨ 汪荣祖:《史传通说》,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73页。

习凿齿史论的时代特征

君臣之伤教,而不知兼无父子为重,岂不蔽哉”,评卞丘俭“可谓忠臣矣”,(上引均见表1)凡发论,皆有着清晰的是非、褒贬和善恶观,其中的“惩劝”意旨判然分明。

表1 习凿齿史论条目及断语

序号	论及之人事	史论断语	备注
1	周瑜鲁肃	此乃真所以为小人也。	
2	先主败走当阳	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	
3	曹操不录张松	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	
4	庞统谏先主	夫上失而能正,是有臣也。纳谏而无执,是从理也;有臣则陛隆堂高,从理则群策毕举;一言而三善兼明,暂谏而义彰百代,可谓达乎大体矣。若惜其小失而废大益,矜此过言,自绝远说,能成业济务者,未之有也。	
5	法正劝先主 纳刘璋妻吴氏	今先主无权事之逼,而引前失以为譬,非导其君以尧、舜之道者。先主从之,过矣。	
6	曹操封阎圃	太祖之此封,可谓知赏罚之本,虽汤武居之,无以加也。	
7	费诗谏先主 称尊号	不知速尊有德以奉大统,使民欣反正,世睹旧物,杖顺者齐心,附逆者同惧。可谓暗惑矣。其黜降也宜哉!	
8	后主未逾月 改元	今可谓亟而不知礼矣,君子是以知蜀之不能东迁也。	严可均遗录
9	孔明斩马谡	诸葛亮之不能兼上国也,岂不宜哉! 知之过大,则违明主之诚,裁之失中,即杀有益之人,难乎其可与言智者也。	
10	贾逵援曹休	然则济彼之危,所以成我之胜,不计宿憾,所以服彼之心,公义既成,私利亦弘,可谓善争矣。在于未能忘胜之流,不由于此而能济胜者,未之有也。	
11	张昭闭户拒命	昭为人臣,不度权得道,匡其后失,夙夜匪懈,以延来誉,乃追忿不用,归罪于君,闭户拒命,坐待焚灭,岂不悖哉!	
12	孔明卒引廖立泣 李平病亡	诸葛亮于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	
13	高堂隆	高堂隆可谓忠臣矣。 《诗》云:“听用我谋,庶无大悔。”又曰:“曾是莫听,大命以倾。”其高堂隆之谓也。	
14	司马景王引过	司马大将军引二败以为己过,过消而业隆,可谓智矣。 君人者,苟统斯理而以御国,则朝无秕政,身靡留愆,行失而名扬,兵挫而战胜,虽百败可也,况于再乎!	
15	司马文王赦 三叛党属	君子谓司马大将军于是役也,可谓能以德攻矣。 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此道也,天下其孰能当之哉?	
16	向伯茂	向伯茂可谓勇于蹈义也。 王加礼而遭,可谓明达也。	
17	傅玄论 君臣三年丧	傅玄知无君臣之伤教,而不知兼无父子为重,岂不蔽哉? 诗云:“猷之未远。”其傅玄之谓也。	
18	羊祜陆抗 两境交和	贤人君子,所以拯世重范,舍此而取彼者,其道良弘故也。	
19	卞丘俭举义	君子谓卞丘俭事虽不成,可谓忠臣矣。 古人有言:“死者复生,生者不愧。”若卞丘俭可谓不愧也。	汤球、黄奭均遗录

注:表中引文来自严可均辑《全晋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及乔治忠校注《众家编年体晋史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从上表可知,习凿齿史论,有着鲜明的得失、成败、兴亡之由的析理面向,断语不仅明确,也常常中肯。先主刘备建立蜀汉乃其得以高举“晋越魏继汉”旗帜的起点,但他不因此而迁就刘备,对其

涪城庆会之失予以批判。同样,他虽然在正统序列中忽视曹魏,却并不因此就一味贬低曹操,而是有贬有褒,实事求是。如论曹操不录张松事,无情揭露“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对曹操封阎圃列侯则不吝称赞“可谓知赏罚之本,虽汤武居之,无以加也”。这种不以人废言,也不以言废人的史论态度和惩劝指向,在对待诸葛亮时更为明显。

习凿齿对诸葛亮是有很深感情的,诸葛亮曾寓居襄阳隆中,习凿齿在《与桓秘书》中言:“每定省家舅,从北门入,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①,对诸葛亮的神往之情,溢于言表。这种情感在他《诸葛武侯宅铭》中表达得更为丰满、充沛,铭中叹其“义范苍生,道格时雍”^②。习凿齿著《汉晋春秋》特意采摘陈寿遗录的“死诸葛走生仲达”^③细事,客观上有助于把诸葛亮推上神坛。但即便这样,习凿齿关乎诸葛亮的史论仍是褒贬两有之。如评诸葛亮卒亡使廖立李平一泣一病死事,论云“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岂徒无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忘怒,水镜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又进而赞其用刑公平乃至“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④,极尽夸张之能事;而评诸葛亮斩马谡,则分析说“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而杀其俊杰,退收弩下之用,明法胜才,不师三败之道,将以成业,不亦难乎!且先主诚谏之不可大用,岂不谓其非才也?亮受谏而不获奉承,明谏之难废也”,进而批判他“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节任,随器付业,知之大过,则违明主之诫,裁之失中,即杀有益之人,难乎其可与言智者也”^⑤,揭露诸葛亮三失其过,言辞犀利,淋漓尽致。习凿齿对诸葛亮表扬时基于事实,批评时未予回护,是非与褒贬绝不暧昧。我们看到,从评刘备、评曹操到评诸葛亮,习凿齿都不自觉地做到了辩证统一,因而其中的是非之定、褒贬之别,均不失公允。刘知几称习凿齿史论“时有可观”^⑥,洵非虚言。纵观上述整理的19条史论,习凿齿做到了有的放矢,做到了言之有据,做到了彰善瘴恶,不仅使其史论“以史惩劝”旨归更为确然,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以史惩劝”主旨的实现。

史论随魏晋史学多途发展而进入新阶段。刘知几论及汉末荀悦史论后,言“自兹以降,流宕忘返,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期雄辞,夸其俚事”^⑦,但就上引所见,习凿齿史论盖并非如此。刘知几还说史论“所以辩疑惑,释凝滞”^⑧,这与我们分析习凿齿史论所见,亦有抵牾,习凿齿史论旨趣终归是落在别善恶、明是非、定褒贬上。总而言之,习凿齿史论理胜于文,目的不在于辩疑释滞,而在于彰善瘴恶,惩劝意图极为鲜明。这可能与裴松之注引时摒弃其平庸、选用其不凡有关。但不管怎么说,习凿齿重视史论,其史论并非寻常所见“辩疑惑,释凝滞”,而是以“判明是非”“彰善瘴恶”为出发、为手段、为旨归,无疑进一步丰富了东晋史学时代内涵。他的史论,如同《汉晋春秋》因裁制桓温需要而修撰一样,都是面向社会,都是以史经世,同样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有助于形塑东晋批判史学的时代特征。或如昭明太子《文选》所见,如刘知几《史通》所言,习凿齿的史论,整体上大抵是不如同时或稍晚的干宝、范晔、沈约、臧荣绪、萧子显、裴子野诸家,但同样属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⑨,具有思想性和启迪意义。一言以蔽之,习凿齿史论旨在“彰善瘴恶,以为惩劝”,具有相当的思想活力,包含丰富的思想遗产,不可等闲视之。

① 《晋书》卷82,《习凿齿传》,第2153页。

② 徐坚:《初学记》,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80页。

③ 《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裴松之注,第927页。

④ 《三国志》卷40,《李严传》裴松之注,第1001页。

⑤ 《三国志》卷39,《马谡传》裴松之注,第984页。

⑥ 刘知几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76页。

⑦ 刘知几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第76页。

⑧ 刘知几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第75页。

⑨ 萧统:《文选·序》,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页。

三、因事卷内发论

史论标准之坚守、史论旨归之实现,与史论风格息息相关。换言之,史论风格是我们认识史论的高度与深度,认识史论内涵的重要途径。稍晚于习凿齿的史家范晔,雄于史论。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谈到《后汉书》撰述缘起等问题,对其中的史论反思较多,涉及史论风格,他说:

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瞻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①

学者对范晔的这段论述非常重视,认为“对于史论的重视,并把它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明确提出来,范晔确已超过了以往的史家”^②。范晔具体讲到了《后汉书》中三种史论形态:一是“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二是“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三是“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在讨论古代史论艺术问题时,瞿林东特别关注第二种形态,分析范晔思想说,“他认为史家‘因事就卷内发论’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可以起到‘正一代得失’即对历史作出恰当评价的作用”。进而高度赞许道:“这一认识,反映出史家崇高的历史责任感。”^③

范晔提倡的“因事就卷内发论”,不是蹈空而来。范晔《后汉书》为纪传体,习凿齿《汉晋春秋》属编年体,囿于史体之限,习凿齿《汉晋春秋》中无法全有范晔所论的第一和第三种史论形态,但“因事就卷内发论”则是习凿齿可轻易实现的。现存辑本《汉晋春秋》,见有史事与史论互为表里,于推敲习凿齿“因事就卷内发论”风格,乃至窥探东晋史论时代风格可资借用。

益州是蜀汉政权的根本,益州争夺也可谓三国鼎立格局形成的关键。刘备入川前,益州牧刘璋曾一度示好曹操,结果曹操错失良机。陈寿记云:“璋闻曹公征荆州,已定汉中,遣河内阴溥致敬於曹公。加璋振威将军,瑁瑁平寇将军。瑁狂疾物故。璋复遣别驾从事蜀郡张肃送叟兵三百人并杂御物于曹公,曹公拜肃为广汉太守。璋复遣别驾张松诣曹公,曹公时已定荆州,走先主,不复存录松,松以此怨。会曹公军不利于赤壁,兼以疫死。松还,疵毁曹公,劝璋自绝,因说璋曰‘刘豫州,使君之肺腑,可与交通’。”^④裴松之于“劝璋自绝”后注引了《汉晋春秋》叙事并及习凿齿的评论:

《汉晋春秋》曰:张松见曹公,曹公方自矜伐,不存录松。松归,乃劝璋自绝。

习凿齿曰: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是以君子劳谦日昃,虑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让,势尊而守之以卑。情近于物,故虽贵而人不厌其重;德洽群生,故业广而天下愈欣其庆。夫然,故能有其富贵,保其功业,隆显当时,传福百世,何骄矜之有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⑤

“存录”,意即存恤录用。大概情况是,张松受命去拜见曹操,遭到曹操冷遇,未获起用,因而结怨,张松回去后便游说刘璋自绝曹操。与《三国志》相比,习凿齿录事极简,将整理史事重心放到曹操“矜伐”主观态度上,使曹操个人主观因素在事态恶化过程的影响更为清楚。相较而言,后

① 《宋书》卷69,《范晔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30-1831页。

② 瞿林东:《谈中国古代的史论和史评》,《东岳论丛》2008年第4期。

③ 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重庆出版社2016年版,第87页。

④ 《三国志》卷31,《刘璋传》,第869页。

⑤ 《三国志》卷31,《刘璋传》裴松之注,第869页。

附史论则要丰富得多。习凿齿史论可分三层来理解：一是结合古今论事，将曹操失利后果与齐桓公葵丘会盟后九国叛离恶劣影响联系起来。二是进行抽象析理，从君子谦让亲民美德入手，说明修德对于济业的重要性。三是明确提出观点，对曹操不能兼有天下作出判语。习凿齿从齐桓公骄矜致使诸侯叛离说起，贯彻了他在《晋承汉统论》中“天下事有可借喻于古以晓于今”认识理念，而后又从儒家谦让思想出发进行理论阐释，最后给出明确结论和态度。史论层层递进，观点鲜明，具有相当的说服力。裴松之拿来注引，显然也是对习凿齿史论的高度认同和充分肯定。如果我们再细加思量，会不难发现，习凿齿史论不仅本身自成体系，其与前文叙事相互间也浑成一体。习凿齿史论逻辑起点是“骄伐”，而他在叙事中又点出曹操“矜伐”，如此，史事整理为其发论张本，史论又是载录史事理性延伸，叙事的力量和史论的力量双双得到了增强。习凿齿这般“因事而就卷内发论”，论从史出，史论结合，风格鲜明，体现了习凿齿高超的史才能力，彰显了习凿齿精深的史论内涵。

习凿齿史学观念深处是尊崇晋室，无论是意象中和桓温对话以“明天心不可违”，还是抑魏扬晋主张晋祚乃天命与人事同归，都是实现《汉晋春秋》这种修撰主旨的手段。是以，凡司马氏起家发展过程中有可称颂之处，习凿齿不会轻易放过。前表所列司马师引过与司马昭宴向雄事，便有助于彰显二人的智与德。习凿齿不仅在《汉晋春秋》中详载二事委曲，同时又分别附以史论，对司马师和司马昭进行颂扬。

引过，即承认过失。司马师引过事发生在曹魏齐王芳嘉平四年（252）十二月，距高平陵之变已近4年，彼时曹魏国事已完全“政出司马氏”。这一年十一月，魏吴间战事再起，且以魏失利告终。《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记之云：“冬十一月，诏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毌丘俭等征吴。十二月，吴大将军诸葛恪拒战，大破众军于东关。不利而还。”^①载事极简，不足60字。习凿齿对此事的采摘和整理则颇为不同。裴松之引注云：

《汉晋春秋》曰：毌丘俭、王昶闻东军败，各烧屯走。朝议欲贬黜诸将，景王曰：“我不听公休，以至于此。此我过也，诸将何罪？”悉原之。时司马文王为监军，统诸军，唯削文王爵而已。是岁，雍州刺史陈泰求敕并州并力讨胡，景王从之。未集，而雁门、新兴二郡以为将远役，遂惊反。景王又谢朝士曰：“此我过也，非玄伯之责！”于是魏人愧悦，人思其报。

习凿齿曰：司马大将军引二败以为己过，过消而业隆，可谓智矣。夫民忘其败，而下思其报，虽欲不康，其可得邪？若乃讳败推过，归咎万物，常执其功而隐其丧，上下离心，贤愚解体，是楚再败而晋再克也，谬之甚矣！君人者，苟统斯理而以御国，则朝无秕政，身靡留愆，行失而名扬，兵挫而战胜，虽百败可也，况于再乎！^②

习凿齿记事明显比《三国志》所见丰满，录事重心也不在战事上，而着重突出司马氏战后问责处理，并运用了荀悦《汉纪》“连类列举”法，补录了陈寿未记陈泰讨胡致二郡反事，重点也放在司马师谢过上，最后以“魏人愧悦，人思其报”结语。这段史事整理，显示了习凿齿不凡史才。所记两事，前者战败，后者引发叛乱，本均是司马师主政的败笔，但经司马师处置后，结果翻转，变弊为利。习凿齿敏锐捕捉到司马师对两事的巧妙处理，司马师手段之高超，政治之成熟，都在史事整理后呼之欲出。习凿齿意犹未尽，复加发论，申说司马师“可谓智矣”，分析引过与推过正反两面对民心的影响，最后将其上升到“君道”层面，称颂司马师“虽百败可也，况于再乎”。习凿齿史论以“过消而业隆”为事实基础，承继叙事中“魏人愧悦，人思其报”，又以儒家君道民心观为理论支点，将对司马氏的颂扬意图进一步点明。习凿齿因事立论，将历史叙事与历史评论有机结合，这样既有史实基础，又有理论高度，达到了良好的“宣扬晋室”效果。

① 《三国志》卷4，《齐王芳纪》，第125页。

② 《三国志》卷4，《齐王芳纪》裴松之注，第125页。

司马昭宴向雄事为《三国志》所未录,见之于裴松之引注《汉晋春秋》的补记。事情缘起于钟会功曹向雄收葬钟会,司马昭责难向雄,向雄申辩,言“今王诛既加,于法已备,雄感义收葬,教亦无阙。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以此训物,雄曰可矣”,司马昭折服并改而宴会向雄。习凿齿用记言方式对史事作了整理,而后发论:“向伯茂可谓勇于蹈义也,哭王经而哀感市人,葬钟会而义动明主,彼皆忠烈奋劲,知死而往,非存生也。况使经、会处世,或身在急难,而有不赴者乎?故寻其奉死之心,可以见事生之情,览其忠贞之节,足以愧背义之士矣。王加礼而遣,可谓明达。”^①习凿齿褒扬向雄“可谓勇于蹈义”后,还特地称赞司马昭“加礼而遣,可谓明达”。习凿齿先记司马昭责难向雄事,继而又由此发论,继续了“因事就卷内发论”史论风格。习凿齿所记和所论,为陈寿《三国志》所未见,同样显示了习凿齿独到史识。裴松之引来补注《三国志》,也显现他对习凿齿史事采摘和所作史论的赏识。

如果说上引习凿齿对曹操及司马氏史论因轻魏重晋而偶有偏失,那么他对“羊祜陆抗两境交和事”的采撰和发论,无关立场,足以表现一个史家纯粹的职业素养。羊祜陆抗交和乃是一美事,《晋书·羊祜传》有记载,《三国志·吴书·陆抗传》则未录。裴松之于陈寿记陆抗“得将士欢心”后,补注了孙盛《晋阳秋》和习凿齿《汉晋春秋》的载录。孙盛记事简约,仅50余字,习凿齿叙事字逾200,记事记言均详于孙盛。而后,裴松之复补习凿齿评论:

习凿齿曰:夫理胜者天下之所保,信顺者万人之所宗,虽大猷既丧,义声久沦,狙诈驰於当涂,权略周乎急务,负力从横之人,臧获牧豎之智,未有不凭此以创功,舍兹而独立者也。是故晋文退舍,而原城请命,穆子围鼓,训之以力;治夫献策,而费人斯归;乐毅缓攻,而风烈长流。观其所以服物制胜者,岂徒威力相诈而已哉!自今三家鼎足四十有余年矣,吴人不能越淮、沔而进取中国,中国不能陵长江以争利者,力均而智侔,道不足以相倾也。夫残彼而利我,未若利我而无残;振武以惧物,未若德广而民怀。匹夫犹不可以力服,而况一国乎?力服犹不如以德来,而况不制乎?是以羊祜恢大同之略,思五兵之则,齐其民人,均其施泽,振义网以罗强吴,明兼爱以革暴俗,易生民之视听,驰不战乎江表。故能德音悦畅,而襁负云集,殊邻异域,义让交弘,自吴之遇敌,未有若此者也。抗见国小主暴,而晋德弥昌,人积兼己之善,而已无固本之规,百姓怀严敌之德,阖境有弃主之虑,思所以镇定民心,缉宁外内,奋其危弱,抗权上国者,莫若亲行斯道,以侔其胜。使彼德靡加吾,而此善流闻,归重邦国,弘明远风,折冲於枕席之上,校胜于帷幄之内,倾敌而不以甲兵之力,保国而不浚沟池之固,信义感于寇仇,丹怀体于先日。岂设狙诈以危贤,徇己身之私名,贪外物之重我,闇服之而不备者哉!由是论之,苟守局而保疆,一卒之所能,协数以相危,小人之近事,积诈以防物,臧获之余虑,臧胜以求安,明哲之所贱。贤人君子所以拯世垂范,舍此而取彼者,其道良弘故也。^②

习凿齿史论用字600有余,数倍于此前叙事,是习凿齿除《晋承汉统论》外最长的史论,显见习凿齿对羊祜陆抗交和事的特别重视。习凿齿起论即析理,强调“理胜者天下之所保,信顺者万人之所宗”,以“理胜”和“信顺”作为立论基石,再现了习凿齿史论以儒学为的思想本色。他指出各色人等乃至一般下层,都得持“理胜”“信顺”方能成事。继而以史家宏阔之笔,列举晋文公、中行穆子、治夫、乐毅等人,进一步以史实来证明“服物制胜”不赖“威力相诈”而成。紧接着又着力详细分析晋吴对峙客观形势及羊祜、陆抗各自身处和策略,用语颇为抽象,显现魏晋以来玄学思辨的影响,但一因有前此习凿齿的史事整理为基础,二因“力服犹不如以德来”中心观点较为鲜明,未致读者陷入迷雾。习凿齿进而又升华主题,以“苟守局而保疆,一卒之所能,协数以相危,小人之近事,积诈以防物,臧获之余虑,臧胜以求安,明哲之所贱”为反向衬托,视野由具体行径转至治国战略上来,

^① 《三国志》卷28,《钟会传》裴松之注,第794-795页。

^② 《三国志》卷58,《陆抗传》裴松之注,第1357-1358页。

得出“贤人君子所以拯世垂范,舍此而取彼者,其道良弘故也”的结论,从而有效呼应了起论处的析理。习凿齿的史论以儒学为准绳,以惩劝为旨归,以现实关怀为面向,摆史实、讲道理,将逻辑演绎分析和观点总结升华有机统一,充溢着思想张力。还须指出的是,习凿齿起论便提及“狙诈”者、“权略”者、“负力”者,又反复批判“威力相诈”“协数”“积诈”“威胜”等做法,“惩劝”意旨清晰明确,似乎于当时权臣桓温均意有所指,透露着其“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意旨的执着与彻底。

限于史料,现已无法将习凿齿《汉晋春秋》中所有史论与其对应史事悉数整理出来,但倘若是我们细读习凿齿所有史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除《晋承汉统论》和“通周瑜鲁肃别诸葛”论有“观点先行”而强词夺理嫌疑,其余各条史论本身均是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即便是《晋承汉统论》和“通周瑜鲁肃别诸葛”论,习凿齿也没有从理论到理论,从抽象到抽象,而是步步即事言理,结合历史事实去展开历史解释,和同时期袁宏“务饰玄言”^①不同,和稍后谢灵运“虚张高论”^②也有不同。这种史论风格,做到客观事实与主体认识和谐统一。质言之,“因事而就卷内发论”,是习凿齿史论典型风格和特色,成习凿齿史论取胜之道。习凿齿早年即“以文笔著称”^③,其史论大抵上形质相兼,史家本色更为鲜明,与刘知几所批判魏晋以来“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丽事”的史论,是有很大的距离的。

四、结语

史论的目的何在、意义何在,是个理论性很强且具有实践意义的问题,本质上是历史学功能问题。《晋承汉统论》涉及问题和观点都很多,其中也包含了习凿齿对史论功能的理解,他说:“凡天下事有可借喻于古以晓于今,定之往昔而足为来证者。”^④可见史论只是手段,史论目的在于“晓今”“证来”,即先秦以来“殷鉴”思想内涵所在。习凿齿继承和发扬了先秦以来史家关注现实、史学面向社会的优良传统。

习凿齿身处的东晋时期,社会政治和史学思想都呈现有新的时代特征。一方面,东晋乃司马氏寄寓江南之政权,内外矛盾交织,外部面临北方政权的军事侵扰,内部有门阀士族之间及士族与皇族之间的权力争衡,是以重建一个强大的、有威信和凝聚力的晋室司马氏政权,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急迫的时代需求。内外动荡反向促使史家这种经世意旨进一步强化。另一方面,受汉魏以来学术思潮的影响,东晋史学继续呈多途发展势态,玄学在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两方面影响了史家及其史学,儒学有所衰微但作为社会意识的底色未有根本改变,在官学兴废无定的情况,史学已然成为宣传儒学一个重要的主阵地。前文已揭,习凿齿《汉晋春秋》撰述,更多的是来自时代现实的驱动,习凿齿终前仍挂怀奏疏《皇晋越魏继汉》,宣扬“晋承汉统”。所以,习凿齿的史论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自在情理之中。

史学具有反思的特性^⑤,史论是这种反思的浓缩与结晶。东晋时代意识和时代问题在历史评论中映射、反思与求解,成为东晋史论的时代特征。形式的多样化,固然是东晋史论时代特色之一,但东晋史论最为突出的时代特征还是表现史论的内容面向上,在于诸如经学式微、玄学兴起、东晋门阀政治等带来的一系列时代问题对史论论题的影响,习凿齿及其同时代史家干宝、孙盛、袁宏的史论莫不如此。习凿齿史论多半聚焦评人物、议兴亡、讨得失等方面,苦心孤诣正在于希冀以史论解决社会矛盾和时代问题,其史论长文抑或史论断章,均一以贯之。诚如学者指出,“晋代单独成篇的史论,其性质与汉代单独成篇的史论有相似之处,也多是立足于现实问题,寻求历代相关经验

① 刘知几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第76页。

② 刘知几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第76页。

③ 《晋书》卷82,《习凿齿传》,第2152页。

④ 《晋书》卷82,《习凿齿传》,第2156页。

⑤ 吴泽:《史学概论·前言》,安徽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教训之论”^①。习凿齿的《晋承汉统论》别自成章,属于此类。司马懿父子篡魏建晋满是权谋,石勒讥讽司马氏“欺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②,连东晋明帝也有“祚安得长”^③之叹。晋德有亏这一无法消解的内在矛盾,乃至后来雷家骥所归纳《晋承汉统论》诸般消极影响^④,想来习凿齿并非一无知晓。《晋承汉统论》回避了这些问题,可能正是在于史论只是习凿齿实现其现实关怀的手段和途径而已。《晋承汉统论》成于《汉晋春秋》之后,另辟蹊径证明司马晋政权的合理性和权威性,是《汉晋春秋》裁制桓温目的延续和发展,也是《汉晋春秋》史论思想总结和升华。大概也因此,《晋承汉统论》才能别具一格,引发后世往复讨论“正统观”,成为东晋史学的时代特色,于奠定东晋史论历史地位的同时,也奠定了习凿齿史论特殊的历史地位。习凿齿诸多史论断章,做到了事理统一,坚持了古代史家道德为先固有立场,旗帜鲜明提出自己主张,断语往往是非判然、善恶分明,对受众产生清晰的警示和惩戒。他的史论注意以儒学为准绳、以惩戒为旨归、因史事来立论,继承并发扬了优良史学传统,从命题和内涵上丰富了东晋史论和史学,引发了后来如裴松之、司马光、朱熹等诸多史学名家认同,也为后来史学家乃至政治家、思想家的历史思考提供了新资源和新课题。习凿齿史论有着丰富内涵,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值得我们全面审视,这也是本文对其史论再认识的原因。

① 宋志英:《晋代史论探析》,《南开学报》2001年第3期。

②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第2749页。

③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杨勇校笺:《世说新语》,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10页。

④ 雷家骥:《中国古代史学观念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51页。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imes in Xi Zaochi's Historical Commentaries

Jin Renyi

[Abstract] Xi Zaochi was a renowned historian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and his *A commentary on Jin Inheriting Han's Legitimacy*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in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ttracting enduring scholarly attention. However, it does not represent the entirety of Xi Zaochi's achievements in historical commentaries. The fragments of his writings reveal distinctive features in the themes and style of his historical commentaries. Xi Zaochi's historical commentaries focused on contemporary issues such as evaluations of personages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regimes. He adhered to Confucianism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 and emphasized moral admonition, carrying forward the fine tradition of historiography which served to governance since the pre-Qin Period, with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His commentaries are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s which ensures a unity between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 enhancing the depth of his commentaries. Xi Zaochi's historical commentaries integrate principles with facts, and the form with substance, thereby enriching the connotation of Eastern Jin historiography and advancing its development during that era.

[Key words] Xi Zaochi historical commentary historiography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characteristics of times

(责任编辑 汪高鑫)